

# 中国政党协商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 丁俊萍 甘久翔 王占可

**摘要:**政党协商是我国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中国共产党不但是政党协商的坚定支持者,也是政党协商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我国的政党协商制度在民主革命时期初步形成并得以确立,在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初期既有一定发展但也经历了曲折,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重新确立和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政党协商制度站在新的起点上,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中国政党协商的历史发展过程,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民主思想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理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追求和团结奋斗。考察中国政党协商的历史发展过程,有助于我们今天加强政党协商、推动我国的政党协商制度不断完善和向更高水平发展。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政党协商;政治协商

**作者简介:**丁俊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研究员;甘久翔,王占可,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968(2016)06-0022-06

政党是现当代社会政治现象的重要特征。一个国家的政党之间关系是这个国家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当代中国,“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就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直接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sup>[1]</sup>中国共产党不但是政党协商的坚定支持者,也是政党协商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政党协商在中国的产生发展有着自身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政治文化传统。我国的政党协商是在中国革命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取得胜利,离不开中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党派的协商与合作。新中国的成立更是与中国共产党倡导和主持、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参加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后,经过6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正式确立并不断巩固和完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的政党协商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不但成为我国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一环,而且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共同努力下,日益成为我国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和和谐政党关系的集中体现。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中国政党协商进行历史考察,并从中得出有益启示。

## 一、中国共产党的酝酿成立过程中包含有协商合作的因素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是近

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考察中国共产党的酝酿成立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包含着诸多协商因素和合作机制,这种协商因素和合作机制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的协商合作。在中国,最早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通过对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学习,通过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逐步认识到要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走十月革命道路,就必须向俄国那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使其充当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从而将关注的目光从青年学生转向工农大众、从进步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立共产党组织。1920年2月,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迁移上海,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和他商讨了在中国建立党组织的问题。<sup>[2](P57)]</sup>因此才会有“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二是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间的协商合作。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固然是近代中国社会及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也离不开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帮助和支持,其中就有多次的协商和讨论。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他们先后在北京、上海会见李大钊、陈独秀,共同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并对李大钊、陈独秀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促进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展。

三是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与各地共产党早期

组织之间的协商合作。1920年6月,陈独秀等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并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此后不久,围绕着是用“社会党”还是“共产党”命名的问题,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1920年8月,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正式成立,取名为“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的共产党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sup>[3](P59)</sup>在酝酿建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间进行了沟通和协商,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之间,都运用不同形式进行了多次的沟通与协商。

上述表明,从政党协商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的政党协商带来了一个强有力的推动者和支持者,并且中国共产党在其酝酿建立过程本身也蕴含着政党协商的历史因子。

## 二、民主革命时期我国政党协商制度逐步形成并开始确立

我国的政党协商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它开始于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领导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后几经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强调“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义”<sup>[4](P276)</sup>。他在某种意义上是近代中国政党合作协商的首创者,也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重要推动者。但孙中山推动的政党之间的合作与协商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他推动的政党合作中,政党之间地位不平等、脱离群众等现象比较明显。

真正倡导并推动中国政党协商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是中国共产党。当然,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由于未能深刻把握我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党的一大并未认识到政党协商合作的重要性,而是“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sup>[5](P3)</sup>，“对现有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sup>[6](P8)</sup>。但是在中共一大会议上,就已经有了政党协商合作的争论。有的代表就提出“同其他政党联合行动,并不违背我们党的原则,我们应该团结所有的人”,“在行动上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sup>[7](P550)</sup>。这就为以后中国共产党参加和主持政党协商做了一定的思想铺垫。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很快认识到了党派之间协商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再加上共产国际的推动,到了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就提出

了“联合战线”的思想,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方法是要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在上列原则的基础上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sup>[8](P45-46)</sup>。在同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上,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sup>[9](P66)</sup>这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协商思想开始萌芽并走向具体化,直接促进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之间的第一次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政党协商的第一次正式实践,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选择。由于国共合作,“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还未能完成的革命事业,在仅仅两三年之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就。”<sup>[10](P364)</sup>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坚持党派合作、联合战线的基本思路,积极参与国民党改组,领导工农运动,帮助黄埔建军,积极配合和参与国民革命军北伐,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提出一些具体的政党协商形式。但是由于孙中山的坚持,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进行的。这无疑与中国共产党的初衷相违背,而且也不符合政党协商对平等党际关系的要求。因此,国共第一次合作虽然推动了民主革命的发展,但也制约了两党协商合作的实际程度,最终合作走向了破裂,不但给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极大伤害,而且也直接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在国统区产生了一批介于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党派组织。民主党派组织的产生给中国革命的现状带来了更为复杂的局面,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但大革命失败后一直到1935年,由于共产国际的影响和中共领导人对城市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的错误认识,由此带来“关门主义”<sup>[11](P155)</sup>,也不可能进行政党协商。华北事变后,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共中央于1935年10月发出《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指出:“统一战线是抗日反蒋的总的策略”<sup>[12](P564)</sup>。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政党协商主张的回归。同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中国共产党的联合抗日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理解、支持和响应,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政党协商真正开始。

由于形势发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在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问题上逐渐达成一致。1936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并希望能建立“你们我们同全国各党派各界的统一战线”<sup>[13](P86)</sup>。9月,中共发出《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要向国民党“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sup>[14](P89)</sup>。中共“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政策的实施和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多方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随后,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赞同共产党的建议,在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恢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案,呼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9月,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国民政府成立的国防最高会议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倡导与各民主党派代表“友好和睦地商讨和决定一切有利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具体办法与实施方案”<sup>[15](P161)</sup>,还在国民参政会中联合各抗日党派团体和抗日民主人士积极发动宪政运动,推动了政党协商和政治协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除了在国民党统治区积极推动政党协商外,还在自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中进行了政党协商的普遍实践,建立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以及中间派合作协商的政府,在抗日民主政权中实行了“三三制”原则。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共产党以外的人员,不问他们是否有党派关系和属于何种党派,只要是抗日的并且是愿意和共产党合作的,我们便应以合作的态度对待他们。”<sup>[16](P742)</sup>抗日民主政权的“三三制”实践,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党协商和联合政府的雏形。1943年,中共又公开表示准备与“中国国民党及其他党派继续进行协商,解决已经存在的问题,改善各党派间的关系……抗日战争应该是始于团结,终于团结,团结是全国人民抗日的基础,也是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基础。”<sup>[17](P55)</sup>以合作、团结的精神来凝聚力量,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政党协商、团结救国的坚定立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经过协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协定指出,“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sup>[18](P326)</sup>。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召开之前,民盟代表同中共代表约定:双方携手合作,相

互支持。在会议期间,中共代表经常同民盟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磋商,本着求同存异的政党协商精神,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会议历时22天,最终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政协协议的通过,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国民党中的民主进步人士共同协商合作的成果。<sup>[19](P697-700)</sup>“双十协定”的达成和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以政党协商为基础的政治协商制度初步形成。虽然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由国民党主导,并最终被国民党彻底破坏,但政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精神却已经在中国各党派和人民中间扎下根来。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团体、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sup>[20](P146)</sup>。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和响应,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是成为新政协运动的主题。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就新政协召开的具体问题,也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协商。1949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建议。1948年秋至1949年上半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纷纷建立和扩大,也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工作。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对拟定参加政协的单位、起草组织条例和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和国旗国徽国歌等工作进行了安排。9月,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基本通过了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政府组织法草案等,并一致通过将新政协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sup>[21](P809-814)</sup>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正式召开,“党派合作、协商建国”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的划时代事件,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党协商制度正式确立。

###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政党协商制度的发展与曲折

由于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因此,我国的政党协商制度实际上已经有了法律上的地位,并成为新中国成立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革命形势与任务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不管是中国共产党内还是各民主党派内,都产生了“民主党派的历史任务已尽”等思想。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民主党派的存留问题,自

然也包括政党协商乃至政治协商的存留问题。1949年12月18日,曾经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宣告结束。对此,中共领导人毛泽东非常惋惜。1950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再次强调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明确了统一战线的形势和任务,也就再次明确了政党协商的必要性。毛泽东也强调指出,“从长远和整体看,必须要民主党派。”<sup>[22](P138)</sup>由于中共中央对民主党派的正确认识,新中国的政党协商有了初步和切实的发展。特别是由于政协代行人大职权的原因,国家的大政方针和重大举措都要先拿到政协平台上进行讨论协商,客观上大大促进了政党协商的发展。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此时,虽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代行人大职权,但是作为政治协商载体的统一战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框架里得以确立。关于政协地位问题存在的争论,毛泽东认为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总之,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我们的政协是有事情做的。”<sup>[23](P386)</sup>经过充分准备,1954年12月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它明确了人民政协的性质、地位、作用和任务的问题,明确了政协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问题,从而为以政党协商为基础的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也使我国的政党协商有了制度化发展的可能。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再次强调:“现在来看,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sup>[24](P34)</sup>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正确处理我国政党关系的“八字”方针,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也为政党协商的继续实践和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确立了指导思想。

遗憾的是我国政党协商的正常发展道路不久就被“左”倾错误阻断了。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严重抑制了我国政党协商的发展,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直接阻断了整个政治协商工作。1977年,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民主党派问题的请示报告》,重申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党协商方针,政党协商工作逐步恢复正常。

**四、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的召开,标志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恢复**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

国政治协商制度的蓬勃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前提。1979年6月,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作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任务》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同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提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多党派的合作,这是我国具体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国政治制度中的一个特点和优点。”<sup>[25](P205)</sup>从而比较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的概念,这也是我国政党协商的基本内涵,标志着以“多党合作”为基础的政党协商制度得以重新确立。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提出了新时期共产党处理民主党派关系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十六字”方针,为新时期中国政党协商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和明确指导。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明确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这是我国第一次将政治协商写入宪法,给新时期政党协商提供了法律保障。

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使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这一概念。1989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友党”关系,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意见》不但把政党协商定位到了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新高度,而且也提出了政党协商的基本形式。

1992年中共十四大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正式写入党章,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这一制度写入宪法,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将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列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内容。至此,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主张,成为了当代中国政党和国家的共同意志,同时也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and 基本途径。

2002年中共十六大强调了要“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

点和优势。”2005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再次强调了要“加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合作与协商”。翌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则再次强调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此外，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还通过确立和强化人民政协的地位，加强了政党协商载体的建设，使中国的政党协商得到了重新确立和发展，也使我国的政党协商以“多党合作”的形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的突出优势。

### 五、十八大以来：我国政党协商制度有了新的起点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2012年召开的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要完善协商民主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加强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的提出，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政治协商的发展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而将政党协商纳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范畴，则使政党协商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2014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人民政协以宪法、政协章程和相关政策为依据，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保障，集协商、监督、参与、合作于一体，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这一思想更加强调了人民政协和多党合作的协商合作价值，进一步明确了政党协商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的地位和作用。

2015年2月，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在这份指导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指出要“继续加强政党协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优势，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加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搞好合作共事，巩固和发展和谐政党关系。”这是中共中央首次明确提出“政党协商”的概念，并对继续探索规范政党协商形式、完善民主党派中央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制度、加强政党协商保障机制建设等提出了要求，有力地推动了我国政党协商和政协协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201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这是中

共第一部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党内法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统战工作的一份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规定“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并对政党协商的内容和形式等作了规定。

2015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意见》不但全面阐述了政党协商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了政党协商的发展方向，给政党协商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起点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政党协商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意见》中还特别强调指出：“无党派人士是政治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参加政党协商”；“工商联是具有统战性的人民团体和商会组织，参加政党协商”。这就大大拓展了我国政党协商的参与主体，巩固了政党的发展。

### 六、结语

考察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关于政党协商的思想与实践，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协商思想及其实践是中国政党协商制度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中国共产党对政党协商的认识经历了从民主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到政治协商、多党合作，再到协商民主和政党协商的不断深化过程。具体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从参加第一次国共合作到主动倡导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积极参与旧政协到主导召开新政协，从自觉实践统一战线到最终确立政治协商制度，从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建国到提出和实行“长期共存”的十六字方针，等等。中国政党协商的历史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主政治的不懈追求，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和民主思想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理念。

政党协商是我国民主革命的重要特色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的基础和前提之一。政党协商巩固和发展了新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即使在曲折时期，各民主党派也始终信任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共渡难关，迎来了改革开放新时代。在当代中国，政党协商已经深深扎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去，也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

中国政党协商的历史告诉我们，进行政党协商要坚持党际关系平等；要有共同的奋斗目标；要有求同存异的理念；要树立正确的思想指导；要注意凝聚力量；特别是坚持和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总结我国发展政党协商的经验教训，发展完善中国的政党协商，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凝神聚力，是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重任。

中国的政党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显著特征,明显区别于西方的竞争政党制度和竞争选举制度。“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sup>[26]</sup>协商民主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之一,在我国的民主政治发展中有着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有效保证了人民民主的落实。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协商必将在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上发挥更加积极和有效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N].人民日报,2015-12-11(1).
- [2][3][19][2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1.
- [4] 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5][6][7][8][9]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 [10][16]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1]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3][14]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1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 [1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20]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 [22]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 [23]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4]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2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26] 国务院新闻办.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N].人民日报,2007-11-16(15).

责任编辑 余洋

(上接第21页)层面概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党的十八大正是在继承和发展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思想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需要,从公民层面提出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四者之间有密切联系:“爱国”是统领,“敬业”是基础,“诚信”是保障,“友善”是表现。作为“基础”的敬业价值观,既是公民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也是“爱国”“诚信”和“友善”价值观的实现途径。

作为公民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和实现途径,敬业价值观是实现“中国梦”的动力之源。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都离不开“爱岗敬业、争创一流,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劳模精神。这是因为劳模身上有一种为祖国昌盛、为人民幸福、为民族复兴而兢兢业业、拼搏奉献、建功立业的敬业精神。把敬业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素加以倡导,也有充分而深刻的实践依据。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梦想总归要变成现实,

从梦想到现实的转变必然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需要艰苦奋斗,需要勤奋敬业,需要拼搏奉献。习近平多次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并指出,“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开创我们的美好未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为了人民,必须依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敬业价值观是实现“中国梦”的动力之源。

####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张萃萍.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职业解读(当代敬业精神的价值及其培育)[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
- [6] 庄锡吕,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 王娟